

蘇州史志資料選輯

第四輯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苏州 档案局 编

苏州史志资料选辑

第四辑

(内部发行)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苏 州 市 档 案 局

编

编 辑 说 明

一、本选辑编印之目的是为了反映我市编史修志的成果，利于交流、核对和保存苏州地方史志资料，以供领导部门和各有关方面研究参考。

二、本选辑所收资料以1911年至1982年修志时限内有关苏州地方历史的文献、口碑资料、专业志稿、人物传记及其他资料为主，对1911年以前而具有参考价值的未刊史稿、专著和旧志资料，亦酌量选登之。

三、本选辑所载文献资料除加标点和必要的注释外，一般均照录原文，以保存原貌。

四、本选辑系内部资料，所载之文献和稿件，请勿擅自引用，公开发表。

五、我们囿于见闻和限于水平，竭诚欢迎提出补充和订正，以臻详实。

目 录

- 苏州评弹的历史 周 良 (1)
潘鑑芬先生传略 潘咏召 (20)
缅怀潘万玉先生治黄功绩 杜兆田 (26)
潘公在花园口 陈伯起 (28)
程小青先生事略 登 程 (34)
苏州租界之略述 (45)
祥符寺巷90号
——汪特巢穴记实 黄秉贤 (53)
苏州电厂与振兴电灯公司诉讼始末
——苏州电气公司的创建
..... 苏州市供电局编志组 潘尔卿 (67)
苏州市公共汽车的建立和发展
..... 苏州市公共汽车公司编志组 (78)
苏州邮电历史资料选编
——邮政、电报、电话
..... 苏州市邮电局编志组 (90)
松鹤楼史话 苏州市饮食服务公司编志组 陈群明 (165)
解放后三十四年苏州市大事记(连载三)
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
..... 苏州市档案局编 (193)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苏州评弹的历史

周 良

渊 源

曲艺的历史，源远流长。

早在原始社会中，就有了口头流传的民谣、民歌、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民歌、民谣经常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唱着流传的。唱着的民歌，如果是叙事的，唱出故事来，就是韵文说唱的起源。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中有民间故事、神话在流传，是散文形式的民间说唱。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保存了一部份上古时代的民歌。其中一部份作品，已经有了情节和人物，为叙事诗的萌芽和雏形。

到了汉代，在乐府中，民间叙事诗得到了发展。如《东门行》、《十五从军行》、《陌上桑》等诗篇，都有较多的叙事成分。东汉末年建安时代产生的《孔雀东南飞》，是叙事诗趋于成熟的作品。南北朝时出现的《木兰辞》，也是长篇叙事诗中的名篇。

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故事，用文字记载保存下来的不多。但现存的神话故事中，有不少创造了鲜明的形象和动人的情节，后来还被吸收到戏曲和说唱中。

民间叙事诗和民间故事、神话的流传，与讲唱艺术结合，民

间的讲故事人和民间歌手，逐渐由业余转向半职业化和职业化，由农村转入城市，就逐渐形成了曲艺艺术。

由于民间艺术过去不被重视，所以记录下来的资料不多。能见的记述，语焉不详，真相难明，给曲艺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以这样说，唐代已经有了职业演出的民间说唱艺术。由于敦煌文献的出世，使我们见到了虽然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的几篇话本。如《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和佛教的“变文”不同。唐代的民间说唱艺术，“说话”、“小说”和“变文”，无论题材、体制、形式各方面，都和宋代的说话艺术有直接联系，而且和后世的评话和弹词有渊源关系。

城市经济的繁荣，是说唱艺术发达的经济基础。城市人口增多，市民阶层逐步扩大，说唱艺术有了广大听众，职业艺人的队伍也就发展。艺术交流得以进行，艺术积累日渐丰富，有了逐步提高的可能。所以到宋代，说唱艺术有了很大发展。有了大量的职业艺人，而且技巧高，分工细，有了专门的演出场地。

宋代说唱艺术的形式很多，就名目而言，有小说、说经、说参请、讲史、合生、商谜、说诨话，而小说又分成烟粉、灵怪、传奇、公案、铁骑等类。在讲史中又有专门说“三国”和“五代史”的，有专门说当代故事的“新话”。在名目众多的说唱艺术中应该提到讲史和小说。讲史是只说不唱，或以说为主的。也有韵文，是念诵、吟哦。如《醉翁谈录》说的，“曰得词，念得诗”即是。还有“诗曰”、“词云”也是韵文，有如后来评话中的赋赞。有的是开相、描景、状物，或是说书人的称颂与感叹。讲史的发展和继承，即后世各地之评书和评话。

小说中有又说又唱的。《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的较早的小说话本。搜集在这两个集子中的作品，都

是有韵文的。《刎颈鸳鸯会》中，说“因成《商调醋葫芦小令》十篇，系于事后，少传斯女始末之情。奉劳歌伴，先听格律，后听芜词”。说明是唱的，有人伴奏，说了又唱，唱了再说。韵文部份有词曲，如《商调醋葫芦小令》、《望江南》、《南柯子》、《踏莎行》，还有诗，七言和五言都有。《快嘴李翠莲》中，主要是七言诗。

讲史是长篇故事，保存在话本小说中的故事，较之讲史篇幅较短。但这两个小集子的话本，都可能只是繁简不同的提纲，所以不能认为小说都是短的。至少，也有长的。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西山一窟鬼》：“话说沈文述是一个士人，自家今日也说一个士人，因为行在临安府取选，变做了十数回晓蹊作怪的小说。”那就是长篇了。

由此发展起来的说唱，后人根据唱的曲调的不同，把有说有唱的曲种，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乐曲系统，用词和曲牌，如诸宫调、道情、牌子曲等；一类是诗赞系统，唱词以诗为主，如陶真、盲词、鼓词等，苏州弹词也属这一类。

形成和发展

曲艺的历史很长，但保存下来的资料很少，记录曲艺语言的资料，限于当时的条件，就更少了。因此，今天要研究曲艺的发展的历史，各地曲种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相互影响和变迁就相当困难。

曲艺的大部份曲种，是用方言演唱的。形式相同和相似的曲种，由于方言的不同，就分成许多曲种。如同样是评话（在北方叫评书），因所用方言不同，就有许多种类，如苏州评话、扬州评

话、福州评话、贵州评话、湖北评话、四川评书等。同为鼓书，就有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唐山大鼓、长沙大鼓、太原大鼓、辽宁大鼓等，主要也是方言不同，和所用的曲调，带有各自的地方色彩的缘故。

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在曲艺和各地曲种的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可能存在者相反的，但又是同时进行的两种趋向。一方面，某些曲种在发展和扩大流行地区，在扩展过程中和新流行地区的方言相结合，逐渐改用当地的方言，形成了新的曲种。这不只是为了满足当地听众的要求，更好为听众所喜闻乐见，而且也是反映当地群众生活所必须。原来流行在以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说话，随着宋代的迁都，到了临安。因为大量中原人口的南迁，说话也就随着听众一起南迁了。但要吸引南方听众，扩大听众面，就得采用南方的语言。南迁的是北方的说话人，到南方，说话的有了南方人。如《南村辍耕录》二十八卷所记载的讲史人丘机山，就是松江人。以今例古，评弹在苏北海门、启东一带的流传，目今已在和当地方言相结合。这种趋势是明显的。上面讲到的，各种评话，各种大鼓书，也是例证。

另一方面，某些曲种，由农村向城市和集镇发展，推进大城市，在逐渐发展、扩大流行地区的进程中，其语言，由方言趋向能为更大地区、更多人接受的语言发展。如最近几十年的相声，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流行地区的扩展，推向了全国。它的语言，由北京方言改成了普通话。

苏州评弹就是讲史、小说，也就是说书走向各地发展的过程中，和吴语相结合的产物。为了探索采用苏州方言的评弹形成时间，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是不多的。

“说书”一词，明时就有。朱权《太和正音谱》：“（折末）道

字、说书、打令，诸般儿乐艺都曾领。”但指哪种说唱形式，未能具体了解。王圻《稗史汇编》：“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不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这里的“说书”，似指章回体小说。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又缀·卷一》：

“宋王防御者，号委顺子。方万里挽之曰：‘温饱逍遥八十余，稗官原是汉虞初。世间怪事皆能说，天下鸿儒有不如。耸动九重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哀江南赋笺成传，从此韦编镇蠹鱼。’盖防御以说书供奉得官。”这里的“说书”是指说唱。

冯梦龙为苏州人，在他编集的《山歌》中，一首题为《山人》的山歌中有句为：“咦，弗知是说书老人？”可能是苏州人的称谓。《民钞董宦事实》中记述了明万历年间，一个苏州说书人叫钱二的，演唱了揭露董其昌一家鱼肉乡民强抢妇女的故事，书名《黑白传》和《五精八义记》，以至受到迫害。这肯定是说书人说书，说苏州发生的故事，是否用苏州话说书，则不得而知。

“评话”一词源于宋，为讲史的另一名称。元刊本讲史，今有传本。《永乐大典》中，保存了不少评话本的名目，但话本内容都没有留下来。

李玉《清忠谱》中，描写了苏州露天说书的情况，这是在苏州说评话的较早的具体描写的资料。

(字字双)(丑扮老男上)阊门好汉我为头，名旧；飞鸿六顺好拳头，传授；赌场到处掼拈头，打就；人人认得老扒头，年幼。自家姑苏城外，有名的周老男、周文元便是，少年无赖，独霸一方。城市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每日倒有一、二千钱拉下，

除了他吃饭书钱，其余剩下的，尽勾我买酒吃，赌场顽耍。昨日说过金兀术破鄜延州了，他说今日要说童贯起兵，甚是热闹。此时日已过午，不免催促他来，撑起布蓬，聚人开说则个。正是：要知千古兴亡事，须听当场评话来。（下）

这种露天说书的情景，解放后的苏州，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说书人的说白中有苏州话。

弹词的称谓，最早见之于记载的，是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

《西游补》描写的弹词，是盲女弹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唱了吴歌：“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姐儿半夜里打被头，为何郎去你介勿留留？”唱词中的“介”和白中的“托熟”，都是吴语。这是明末清初。在清初，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有《弹词》一首：“四宜轩子半吴音，茗战何妨听夜深。近日‘平湖’弦索冷，丝铜争唱打洋琴。”原注：“亦竹枝词类，然稍有理致。吴人弹《平湖调》，以弦索按之。近竟尚打铜丝弦洋琴。”“吴音”、“吴人”为吴语区域的弹词。现在能见到的有苏州话的较早的弹词脚本，是乾隆年间刻印的。如《新编东调大双蝴蝶》、《新编宋调全本白蛇传》、《新编东调白蛇传》等。

在《新编宋调全本白蛇传》中，出现了“响档”的名称。在《新编东调白蛇传》中，还记录了不少弹词的书目。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如果作如下的推断：苏州话的评弹形成于明末清初，是比较谨慎的。因为，明末清初已经有苏州的说书和苏州人说书的信息，乾隆时期已经有了苏州弹词的刻印的脚本。有了很多书目，而且有了“响档”和“名家”，这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

传下姓名的名家，在乾隆时期，现知者仅王周士。传说他是一个说唱《游龙传》的弹词艺人，曾经为乾隆演出，还总结了评弹艺术的经验，即《书品》、《书忌》。这是评弹历史上现在知道的最早的经验总结，是值得珍视的。也表明苏州评弹艺术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嘉庆、道光年间，苏州评弹进入了兴盛时期。其主要的标志，一是响档、名家辈出，二是书目的繁荣。

苏州评弹历史上有前四名家和后四名家的说法。前四家是嘉庆、道光间的名家，后四家是咸丰、同治间的名家。虽然，现在能知名的不多，但据已有的资料，当时有成就的艺人知名的也不止前、后四大名家。试作简要介绍如下：

陈遇乾 流传至今的弹词“陈调”的创始人，擅唱《白蛇传》和《玉蜻蜓》。又曾对这两部书作了文字加工并因而刊行，今有传本。

张梦高 陈遇乾的学生，擅唱《白蛇传》，对该书进行了整理加工，自成一家。

毛菖佩 也是陈遇乾的学生，对《白蛇传》也进行过加工。

俞秀山 流传至今的弹词“俞调”的创始人，擅唱《倭袍》。传说他一生编写了十多种弹词，对苏州弹词有很大的贡献。

陆瑞庭 对他的生平，很少了解。但他写下了《说书五诀》，对说书的经验，作了有益的概括，提出了很可珍视的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陈士奇 和俞秀山齐名的弹词演员，说唱《白蛇传》和《玉蜻蜓》，陈士奇传张少堂，再传田锦山，都是很有名望的。

姚豫章 对这位前四家之一的名家，现知之甚少。

马如飞 弹词“马调”的创始人，擅说《珍珠塔》，而且对这部书的加工有贡献，风行一时。马如飞对说书团体光裕社的组织和巩固起过很大的作用。光裕社虽为行会组织，但在保护艺人权益，发展评弹艺术方面，也有一定积极作用。马如飞还为同道和后世艺人编辑了一本《出道录》，搜集保存了不少艺术经验谈。虽然是零星记述，但很有价值。

姚士章 评话名家，说《水浒》吸收昆曲中的道白和表演，善于刻划人物，有“活鲁智深”之称。也是光裕社的中坚分子。其师张汉明，也是很有名的大响档。其徒王效松，也是名家。

赵湘洲 是弹唱《描金凤》的名家，又能说唱《玉孽龙》。他说过：“单档难于不寂寞，双档难于同语。”这是他对弹词单双档艺术的体会。证明了他活动的时代（咸丰、同治间），已经有单双档之分。他的儿子赵鹤卿、孙子赵筱卿，都是说唱《描金凤》的，一门三代名家。

王石泉 说唱《倭袍》的弹词名家。为马如飞的女婿，当为同治、光绪间的艺人。

还有一些缺乏可考资料，但知姓名的艺人，如章廷玉、姜万孚等。

在光绪戊子（1888）上海书局印的《新增笑中缘图咏》第三〇卷《邀儒》中，有一段插科：

（白）讲到初三早上，三学生员，大家吃了早饭，更换衣巾，也有贫的，也有富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纷纷都到明伦堂齐集。内中有几位说书先生，唱词先生。徐子建邀他一并同来与祝枝山评理。（唱）不衫不履笑含含，第一位先生吴德山，梅世龙搭金亮采，好将评话与他谈，陆士珍、俞秀山，陈士奇、杨驾帆，这几个能言舌辩年档齐来省，子建相邀一共来。

其中，提到了一些艺人的姓名，很少他们的资料。
同治以后的艺人，现在知名的就多了。

光裕社的《出道录》中，记载了同治光绪及其后“出道”^①的艺人的名姓。其中同治年间为三十三人，光绪年间为一百十人，宣统年间为十二人。开始从业的艺人相当多，而且这个记载还是不完全的。

上面提到的同治间的艺人，在《出道录》中，也记载了他们带领的艺徒。如：

赵湘洲	同治八年(1869)	领子赵鹤卿出道 领徒钱玉卿出道 领徒许荣庭出道
	同治十一年(1872)	领徒胡筠卿出道
马如飞	同治九年(1870)	领婿王石泉出道
	同治十二年(1873)	领门生程少珊出道
	光绪三年(1877)	领徒俞莲生出道
王石泉	同治十二年(1873)	领徒叶勇泉出道
	光绪三年(1877)	领徒王吟香出道
	光绪五年(1879)	领徒蔡吟差出道
	光绪十三年(1887)	领徒汪福昌出道
	光绪十七年(1891)	领徒徐芝堂出道
	光绪十九年(1893)	领弟马一飞出道 领朱寄庵出道
	光绪二十一年(1895)	领夏锦峰出道
	光绪二十三年(1897)	领钱幼卿出道
姚士章	光绪十二年(1886)	领徒王效松出道

以上的艺人先后带了许多艺徒，也说明评弹的兴盛。

现在知名的一百多部传统书目，产生的年代不可确考。能上推的最早传人，在嘉庆间的，如《隋唐》、《水浒》、《金枪》、《三笑》、《玉蜻蜓》、《白蛇传》等。在道光年间的，如《岳传》、《济公传》、《双珠球》、《文武香球》等。其在咸丰年间的，如《三国》、《英烈》、《五虎平西》、《落金扇》、《描金凤》、《大红袍》、《九丝绦》等。在同、光间的，如《金台传》、《珍珠塔》、《倭袍传》、《双珠凤》、《东汉》、《西汉》、《七美缘》等（以上均据苏州评弹研究室《苏州评弹传统书目流传概要及历代艺人系脉》）。还有许多书目的传人未能上溯到创始者，上述情况，约略可见当时书目的繁盛了。

当时，评弹还有了行会组织，亦足以证明当时评弹的兴盛。光裕社是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相传始于王周士时代，现有文字资料能考者，为同治年间。

繁荣和商业化倾向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兵长江，江南一带的豪富之家纷纷避往上海，形成了十里洋场的繁华世界。辛亥革命后，军伐纷争，战乱不已，上海愈益畸形的发展。上海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孕育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曾经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据点。上海又是冒险家的乐园，豪门贵族和剥削阶级的销金之窟。

评弹进入了上海，上海且成了评弹繁荣发展的大本营。开了许多书场，电台也开办了空中书场。有钱人家还有堂会，成了名的演员，演出繁忙，一天到晚要赶许多场子。艺术上的竞

赛也很激烈。到上海书场演出，成了“跳龙门”。一般演员进不了上海书场。在上海站住了，演长了，到各地也就容易受到欢迎。竞争促进了艺术上的发展，促使艺术上的革新。本世纪初，光裕社分化，成立了润余社，其后又有以男女合作演出为号召的普余社，以及同义社、宽裕社、萃和社等出现，也反映了艺术上的竞争激烈。颇有革新色彩的润余社是在上海组成的，出了不少名家和新书目。如朱少卿的《刺马》，李文斌的《杨乃武》，程鸿飞的《岳传》（人称野《岳传》），还有夏荷生等响档。

进入二十世纪后的三、四十年代，评弹界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流派纷呈。现在仍有传人的许多流派，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一方面是人才的生长；一方面是人才受到摧残。一方面是艺术在提高；一方面受到商业化的影响，艺术的发展中存在严重的不良倾向。在旧社会，评弹演员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属于三教九流之末，被人看不起的。剥削阶级为寻欢作乐，排遣百无聊赖的空虚，需要娱乐，需要评弹。但对艺人并不尊重，只是一种戏弄，当作玩物来看待的。演员又经常受到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及其生活方式的引诱和腐蚀，以至走上歧路，腐化堕落。一些稍有名声的演员，或者是过度劳累的演出，精力不济，乃至吸食毒品，或者受到勾引而堕落，往往不得善终。

在这繁荣时期，也生长了大批书目。由于评弹的活动进入大中城市，尤其是艺术的主力逐渐集中到上海一带。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繁荣发展的评弹，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城市小民意识的影响很大。所以新编书目中，虽然出现过一些反映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书目，但都未能保留下来。很少有反映反帝斗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书目。也曾有过一些反映二、三十年代社

会生活的书目，如《啼笑姻缘》、《秋海棠》、《霍元甲》等，数量不多，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很狭仄。这不但影响了评弹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影响了评弹的发展趋向，而且造成了解放后评弹反映现代生活的困难。

在这个时期新编的书目中，也有一些保留下来的。如《杨乃武》是二十年代出现的书目。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出现过李文斌、李伯康、严雪亭等名家，成了一部颇有影响，至今犹在流传的书目。这部书的积极方面，是揭露了封建官僚统治的苛政，揭露了清末官僚吏治的腐败，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二十年代出现的《西厢》和三十年代出现的《长生殿》，也是很有影响的节目。都有古典文学作品为依据，又有评弹细腻描摹的特点。

为迎合一部份听众的需要，在小说和电影的影响下，评弹在三十年代起大大增加了侠义题材的书目，尤其在评话中。在传统节目中，侠义题材的书并不多，《七侠五义》可能是在二十年代移植到苏州评话的，这部书多少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下层群众的愿望。后来，不但有了《小五义》、《续小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书目，还有了《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公案和侠义结合的书目。再发展为剑侠、剑仙，等而下之，荒诞离奇。这类书目的泛滥，反映了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腐败和小市民的苦闷和淫靡情况。

在竞争中出现的，对落后的思想和低下的艺术趣味的追随，又表现为艺术上的歪风邪气。低级庸俗的穿插和噱头，黄色下流的描写和粗俗的语言，加上不好的台风，甚至是卖弄色相的行径，严重的商业化倾向，损害了艺术的健康发展，且为解放后的评弹发展，留下了不良的影响和消极因素。

新 时 代

新中国的建立，评弹艺术进入了新的时代。评弹是群众的艺术，随着人民群众的解放，进入了新天地。人民在前进，思想在提高，促使评弹艺术迅猛前进。

评弹虽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经历过非常繁荣的时期，有丰富的艺术遗产，出过不少艺术家，但那是在旧时代，几乎是自发地、自流地进行的。在新社会，要求评弹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新评弹的建设，可以借鉴历史，但要新的创造；应该继承传统，但要革新发展。

评弹在新时代的地位改变了。评弹演员的社会地位改变了，提高了。在旧社会，评弹演员是被人看不起的，“背包袱，走官塘”，走江湖，是下贱的职业，生活上颠沛流离，糊口为难。即使是获得了一定的艺名，仍然是剥削阶级的玩物，经常是黑暗社会的牺牲品。而在新社会，评弹演员是文艺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主人，且被提高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地位。

陈云同志曾语重心长的说过，评弹艺人是革命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是对评弹演员的信任和重托，也是鞭策。

其次，随着评弹艺术地位的变化，解放以来，书目的推陈出新取得了成绩。

评弹的传统书目大都产生在封建时代。在书目中，有不少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的人民性的精华，但又有封建性的糟粕，而且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这就要对传统书目进行整理，推